

法国调节学派制度与演化经济学概述

贾根良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来,法国的一些经济学家通过对马克思、凯恩斯和卡尔多经济理论的独特结合,并从布罗代尔等人的法国年鉴学派和波拉尼、熊彼特的理论中汲取灵感,发展了一种研究资本主义经济长期演化的独特方法,在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的发展中,形成了法国的“调节”学派。与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的其他流派相比,该学派的特点是在经济变迁的研究中采用了历史的、理论的和比较的方法,致力于发展一种制度与演化的宏观经济理论。调节学派最著名的工作就是运用其框架对美欧资本主义从福特制向后福特制的转变进行了分析,这对社会科学的其它领域如经济地理学和社会学等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世界体系学派就吸收了这个学派的许多重要研究成果。80 年代以来,调节理论被运用到对转型经济、发展中经济和世界经济全球化的研究之中,目前它已逐渐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影响的经济学流派。

见,协整理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三、结束语

本文对协整理论的起源、背景和若干方向的研究现状作了一个粗略的阐述,旨在能引起读者对宏观计量的关注和兴趣。无论是从研究我国的经济问题,还是从加快我国经济学学科建设来看,研究和应用宏观计量都有其必要性和迫切性。

参考文献:

- ① A. Banerjee, et al. (1994), Co-integration, Error Correction, And The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Non-Stationary Dat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② G. S. Maddala, In - Moo Kim (1998), Unit Roots Cointegration and Structural Chan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③ B. B. Rao (1994). Cointegration, The Macmillan Press.
- ④ R. F. Engle, D. F. Hendry, J - F. Richard (1983), "Exogeneity", *Econometrica*, v. 51.

一、起源与研究纲领的形成

按照杰苏普(B. Jessop)的看法,调节学派至少可以区分出具有某些差异的三个支流,但影响最大的是发端于法国巴黎的调节学派。与绝大多数其他经济学流派产生于学院式的研究不同,调节学派的起源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来自于实际经济问题的经验性研究。该学派的几位重要创始者当时任职于中央经济管理机构,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采用应用宏观经济学的分析工具,研究法国的经济趋势。众所周知,20 世纪 60 年代末,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出现滞胀危机。在英语国家,经济学家们对菲利普斯曲线失灵的争论导致了货币学派的兴起,货币学派认为,由于自然失业率的长期存在,通过政策手段控制需求的宏观干预只具有暂时效应,菲利普斯曲线的失灵是凯恩斯主义的危机。但对调节学派先驱者来说,菲利普斯曲线的失灵具有更深刻的原因,菲利普

- ⑤ M. H. Pesaran, Yongcheol Shin (1996), "Cointegration and speed of convergence to equilibrium",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71.
- ⑥ C. W. J. Granger (2001), "Macroeconometrics: Past and future",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00.
- ⑦ S. Johansen (1992), "Determination of cointegration rank in the presence of a linear trend",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 and Statistics*, 54(3).
- ⑧ R. F. Engle, C. W. J. Granger (1987), "Cointegration and error correction: Representation, estimation, and testing", *Econometrica*, 55(2).
- ⑨ D. F. Hendry (2000), "On detectable and non-detectable structural change", *Structural Change & Economic Dynamics*, 11.
- ⑩ D. F. Hendry, G. E. Mizon (2000), "Reformulating empirical macroeconomic modeling",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16(4).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

(责任编辑:李仁贵)

斯曲线实际上是代表着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正是资本积累的趋势和分配手段的矛盾导致了菲利普斯曲线的失灵。为了解释这个问题,调节学派的先驱者转向了罗宾逊、卡莱茨基、古德温(R. Goodwin)和马克思而非弗里德曼,他们批评了当时流行的应用宏观经济建模所存在的缺陷,研究了二战后法国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积累趋势以及它们所导致的冲突,提出了“增长黄金时期”的终结和长波下降阶段开始的假说。同时,国际比较也使他们认识到,在各国的积累趋势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别。这些经验研究使法国学者采用了一种经验观察起着重要作用的现实主义方法论,孕育了调节学派研究纲领的形成,它突出地表现在当时对高通货膨胀率的研究报告中。

法国数理经济学计划化预测研究中心(Centre of Studies in Mathematical Economic Forecasting Applied to Planning)1977年发表的通货膨胀研究报告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采用了阿加利塔(M. Aglietta)的博士后研究成果,它明确地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第二部分则是更经验性的,它没有参照马克思的理论。威岱尔(J-F. Vidal)认为,阿加利塔的工作通过该中心的研究报告对调节学派研究纲领的形成产生了影响,它首先通过利普西(A. Lipietz)发展了调节学派对历史与辩证唯物主义的新理解;然后又通过“不可知论”的转向使历史与辩证唯物主义演变成了历史的与制度的宏观经济学。

阿加利塔在其著作《资本主义的调节与危机》(1976)的导言中,明确地陈述了他的方法论大纲。他指出,增长是由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剧变所构成的,同时由社会和政治矛盾相伴随,主流经济理论忽视了增长问题的这两个基本方面。研究增长问题的目的是确认长期内改变社会体制并使之保持连贯性的力量,解释引起质变的条件和行为类型,发现经济危机在这种转变中所起的作用,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是这种研究的基本方法。但与传统理解不同,阿加利塔认为,作为上层建筑的制度对资本积累有很大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它甚至作为基础结构对其起着轴心的作用,而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各阶级之间相互妥协的结果,它具有一种在综括的动态中把各种具体的行为形态结合起来的效应,为市场行为提供稳定的预期和连贯的框架,成为宏观经济学的基础。利普西发展了阿加利塔的这些思想,对当时流行于法国的“结构马克思主义”所谓结构在没有任何重大矛盾的情况下能够自我生产的看法提出了批评,拒绝其对经济行为者能动性的忽视。

与利普西对调节学派的发展有所不同,大多数调节学派学者对世界的看法采取了一种不可知论的态度:为了解释真实的世界,没有必要诉诸于不能观察的看不见的世界。因此,他们不再关注劳动价值论的深奥世界,而是围绕着宏观经济学中国民收入核算和价格这些外部变量对现实进行解释,从而使调节学派转变成了历史的与制度的宏观经济学。这种转变具有两个特点,一是与传统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同,调节学派认为,即使在最严重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我们也无法确定能否突现出一种新的和更好的积累体系,社会经济制度的发展具有不确定性的未来。二是受法国年鉴学派“长时段”思想的影响,调节学派通过对18世纪末以来法国经济的研究,划分了老式的、竞争的和垄断的(福特制)三种“调节”或发展模式,讨论了第四种发展模式(后福特制)特征的不确定性,证实并强调了该学派的基本思想:技术虽在长期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它依赖于与基本制度形式的相容性,以及调节模式处理积累不平衡和社会冲突的能力。

总的来说,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调节学派的发展是为了反对“结构马克思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有关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观点:资本主义以不具人格地和不可改变地自动地自我生产,这实质上是一种静态的解释。调节学派与之对立地提出了“调节”概念,在法语中,“调节”(regulation)这个概念更接近于系统论的含义:系统的各个不同部分或过程在某种条件下交互调整从而产生某些有序的动态。正如杰苏普(1994)后来所总结的,“调节”这个动态概念强调了,在与资本主义不稳定变化的客观需要相适应的特定条件下,历史上因事而变的经济和非经济机制交互作用导致了经济行为者所采取的行动。相对稳定的资本主义的扩张取决于相当特定的制度实践,但这些制度的共存与连贯性不能被视作是理所当然的,而是偶然事件、有意识的社会行动以及在生产者背后起作用的经济趋势等因素多样化结合的结果。调节学派强调了制度重要、社会经济演化的不确定性质以及在宏观经济学的框架中解释资本积累的过程。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调节学派的研究纲领最终形成了,发展了该学派最适合于探索资本主义演化的核心概念。

二、分析框架与理论观点

自19世纪以来,如何把经济的历史特点和经济理论结合起来是持久争论的主题。调节学派认为,

新古典经济学不考虑任何时间和地点,提供的是一种非历史的经济规律,因而它不能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性演化过程;而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期动力学虽然强调了社会关系和积累过程的历史特定性,但他使用的概念过于抽象。因此,阿加利塔和博耶(R. Boyer)这些调节学派的先驱者们认为,为了发展一种对资本主义多样化经济形态的演化进行解释的理论框架,“调节”方法应该从更抽象的概念(如生产方式)中找出中间概念和模式,如积累体系和制度形式等,用来解释经济行为者在相互作用时表现出来的规则性,最后再与观察到的事实进行相当细致的比较。调节学派试图通过发展马克思的制度理论,把制度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结合起来,开创一种不同于从前的历史的和制度的经济理论。

在调节学派的分析框架中,积累体系(accumulation regime)、调节模式(model of regulation)和制度形式(institutional forms)构成了调节理论的概念基础。积累体系是指长期内不断再生产出来的生产和消费互补的型态,积累的逻辑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特征,历史为积累的非线性提供了证据:积累的增长型态由危机所间断,这些型态可以被看做是在某种时期稳定的结构,积累体系就致力于描述这种型态。

调节模式一般地用五种制度形式来分析。第一,货币信贷关系,包括银行和产业的关系,股票市场在产业融资中的作用,流动性创造的机制,货币管理的类型,以及国家和国际金融系统发展的结构和程度。第二,资本与劳动关系,它具有关键性的作用,主要包括:工作过程的组织;技能等级;工人流动;直接和间接的工资形成;工资收入的使用。第三,竞争形式,一个基本的区分是传统的价格竞争和垄断竞争。现在更广泛地认识到了企业间、地区间和国家间竞争的形式;认识到垂直和水平一体化以及准一体化的新形式(如战略联盟和网络组织)对竞争的影响。第四,国家的作用,这包括财政、货币和产业政策,以及国家在经济活动和解决社会矛盾中作为仲裁者还是参与者等。第五,国际体系(international regime),这包括国际贸易、投资和资本流动的规则、专业化型态和政治关系等。

当积累体系、调节模式和制度形式相互补充,一度足以确保资本主义扩张的长波所需的条件时,由此所产生的复杂体常常被综合性地分析为发展模式。调节学派认为,社会经济结构主要的制度组织一致性的匹配推动了持续的经济增长,而不匹配则产生了不稳定性、危机和宏观经济的衰退。在调节

理论中,长期动态被看做是不连续的。当一种发展模式的潜力趋于耗尽时,从前各部分之间的连贯性消失了,直到新的连贯性出现之前,存在着不稳定和无序。在这种情况下,积累过程变得越来越与制度形式的稳定性不相容,它无法完成在现有制度基础上的自我再生产,不平衡已达到这种情况:在给定的调节模式中,从前自我修正的机制变得无效了,发展模式陷于危机之中,从而产生了缓慢增长、停滞和不得不进行制度变革的压力。

调节学派运用上述框架对美欧资本主义从福特制向后福特制的转变进行了分析。广义上的福特制是指以大量生产和大量消费为基础的美国生产和生活方式。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和技术体系的发展模式,福特制基于以下增长逻辑的良性循环:通过规模经济提高生产率,并把工人收入的增长与生产率挂钩,从而诱发大量消费,使大量生产得到发展,由大量生产所获得的利润增长转化为投资,使资本得到充分利用,反过来又进一步扩大规模经济。这种发展模式的基础是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粗放积累体系相对应的集约积累体系,它来自以下因素的“有效”互补:(1)生产的机械化、自动化和标准化,它包含了规模经济潜在的足够空间;(2)劳动和产业关系管理上的狭义“福特制”的发展,它是指流水生产线及其相应的工作组织,由泰勒制加机械化所构成,其目的是开发规模经济;(3)基于生产率和消费品价格的工资指数基础上的劳动力市场治理机制,它具有熨平经济周期和维持有效需求的效应,从而导致大量消费的兴起;(4)相应地,产品市场上形成相对稳定的垄断组织形式,如大型公司及其垂直一体化的发展,其目的是形成一种控制工人收入增长的收入分配机制;(5)在宏观经济结构上,需要国家发挥重要作用。首先,为了确保由利润转化而来的投资增长与工人购买力的增长相配合,需要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实施国家干预以维持有效需求。其次,资本主义国家与工人之间要建立起较长期和稳定的合约关系,避免失业等因素危及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基础,这就使福利国家的产生成为必然;(6)由美国支配下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的相配合,如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关贸总协定等。

调节学派认为,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滞胀危机实际上是福特制发展模式的危机,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成为福特制向后福特制转变的时期。调节学派经济学家对后福特制积累体系的基本特征提出了以下三种不同的看法,这些看法对于我们理

解世纪之交世界经济变化的起源和发展趋势是很有帮助的。第一种看法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朴尔(M. J. Piore)和塞拜(C. F. Sabel)在其名著《第二次产业分水岭》(1984)中提出的。他们认为,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初,大量生产是美欧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但在20世纪70年代它却失灵了,资本主义经济面临着从大量生产向灵活专业化的转变。作为后福特制的特征,灵活专业化体现在第三意大利和硅谷这种新型工业区的中小企业网络中。第二种看法是由费里曼和佩瑞兹提出的,他们认为,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对经济的所有部门都有广泛的影响,它在经济系统中的扩散伴随着结构危机和制度创新的压力,以信息和通信技术为基础的新的技术经济范式正在替代老的福特制范式。第三种看法是由哈维(D. Harvey)提出的,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正处于从福特制向一种新的积累体系“历史性过渡”的时期,这种新的体系可以暂且称作灵活积累,与福特制的僵化相对立,它是指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在劳动过程、劳动力市场、产品和消费等方面所产生的灵活性,以及相应的组织创新。

三、评论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调节学派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这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从经验分析的范围来看,他们已突破了局限于美欧国家的做法,扩大到对转型经济和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的研究。例如,萨姆通过对东亚模式的研究,修正了调节学派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时在一些概念(如外围福特制)所存在的不适应性,对东亚奇迹及其危机提出了调节理论的解释。第二,理论发展突出了调节空间的重要性。他们不仅把注意力从给定空间的调节转移到调节空间的积极创造上,而且,他们对调节空间的兴趣已从民族国家转向调节空间的多梯级(multi-scalar)性质上,对经济全球化作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的见解。

对理论经济学的发展来说,调节学派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调节学派真正具有原创性的东西是它试图把制度纳入到宏观经济学的框架之中,这是与传统的宏观经济理论最大的不同之处。调节理论对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过程演化分析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把历史特定的制度条件与总需求发生机制结合起来,内生地解释了经济增长和经济危机的过程。而且,通过对宏观经济总量动态

结合的研究,调节理论能够展示包括分叉和阶段转变的形态发生机制(B. Coriat and G. Dosi, 1998)。所以,虽然他们没有明确地把他们的理论命名和看做是“复杂”理论,但它实质上是今天“复杂”理论所处理的一部分。其次,调节理论采用的是系统论的方法,研究任一经济系统相对连贯的经济社会协调,它通过对经济系统进行制度的和分类的描述,试图确认不同的社会经济体制的某种结构原型,因此,它在格莱夫的“历史与比较制度分析”之外,对比较经济学中的历史与比较研究提供了另一条富有启发性的思路。

笔者认为,调节学派许多重要的理论见解来自于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它试图沿着马克思的传统推进制度经济学的发展。最近,调节学派经济学家奥哈诺把马克思与凡勃伦视作制度的政治经济学的两位奠基者,并广泛探讨了这两大传统在当代发展的内在联系(P. A. O'hara, 2000)。反观我国,新制度经济学过去的十年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但它的新古典基础现在已不利于它的进一步发展,制度经济学要摆脱目前的困境需要引入新思路,在这方面,调节学派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但总的来说,调节学派的理论还不是很成熟,其范围也只是局限于制度的宏观理论方面,特别是在承续马克思的传统上存在着许多不足,这就需要通过总结我国丰富的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经验,并通过制度与演化经济学各种研究传统的交叉,发展我国具有原创性的制度理论。

参考文献:

- ① Agnes Labrousse and Jean - Daniel Weisz (ed) (2001),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in France and Germany: German Ordoliberalism versus the French Regulation School, Springer.
- ② B. Jessop (1997), "Twenty years of the regulation approach: the paradox of success and failure at home and abroad", In B. Jessop (ed) (2001), Regulation Theory and the Crisis of Capitalism, Edward Elgar, 5 vols.
- ③ P. A. O'hara (2000), Marx, Veblen, and Contemporary Institu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Edward Elgar.
- ④ B. Coriat and G. Dosi (1998), "The institutional embeddedness of economic change: an appraisal of 'evolutionary' and 'regulationist' research programmes", in K. Nielsen and B. Johnson (ed), Institution and Economic Change, Edward Elgar.
- ⑤ 贾根良:《重新理解东亚模式:演化经济学的新框架》,《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经济学系)

(责任编辑:香伶)